

通俗文学 指要

刘雪莹/著

辽海出版社

通俗文学指要

刘雪坚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俗文学指要/刘雪坚著.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7. 4
ISBN 7-80638-003-5

I. 通… II. 刘… III. 通俗文学—概论 IV. I 0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7207 号

书 名: 通俗文学指要

著 作 者: 刘雪坚

出 版 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电 话: (024) 3414422

责任编辑: 于景祥 谢 丹

责任校对: 杜宏博

装帧设计: 刘冰宇

版式设计: 秀 俊

印 刷 者: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

地 址: 朝阳市中山大街 3 段 24 号

读者如发现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我厂联系调换

发 行 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字 数: 147 千字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5.875 印张

印 数: 1—1300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38-003-5/I·1

定 价: 10.25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创作、阅读、批评这三个环节形成自然的、有机的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机制。但我国现当代的通俗文学却存在着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它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读者，但理论批评队伍却兵微将寡；八十年代以来阅读通俗文学作品的热潮汹涌澎湃，前所未有的，而理论批评方面却冷冷清清，相对平静，显示出不该有的矜持与寂寥；偶尔发出些回应，但是因为缺乏力度，在波澜壮阔的文艺大潮中显得十分微弱。近年来，这种状况虽然有些改变，批评、研究初具规模，但是从总体上看，它在创作、阅读、批评这一循环系统中还是不相适应，远远达不到要求。与此相反，以诗、词、文、赋为代表的正统文学或曰雅文学的理论批评虽然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步履维艰，但是却有众多的探索者在那里顽强地跋涉，一直保持着可观的势头。阳春白雪，和者不寡；下里巴人，应者不多。最普及、最受大众欢迎的通俗文学，其理论批评还是处在一个很小的角落。我想，是不是那种传统的文化心理还在起作用：稗官野史之类，只配牛叟马走之徒、引车卖浆者流去参与，壮夫尚且不为，何况风雅之士乎？

可贵的是，越来越多的雅有实学之士并没有为流俗所囿，已经开始在通俗文学的研究方面倾注心血，不仅有《中国武侠小说史》、《新武侠二十家》等通俗文学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而且专门的理论批评刊物——《通俗文学评论》也已面世，其

他文学研究刊物上有关通俗文学的理论批评文章也在增加，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刘雪坚先生是出入于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洒脱之士。我们相识多年，相知甚深，他原本在诗、词、文、赋等“雅”文学方面颇见功力，建树可观，但其为人与治学一向不从流俗，颇有独到之处，有感于通俗文学研究方面不该有的冷漠，抗颜而起，不仅多年来一直从事通俗文学的教学工作，而且有志于述作，积数年之功，成此大作。其情可嘉，其功难没。本书虽名为“指要”，但所论述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全书四章之中，第一章侧重于通俗文学一些理论问题的阐释，如通俗文学概念的界定、“雅”与“俗”的探讨、主题和情节问题的剖析、审美特征和语言风格的论述等等；第二章重在探本寻源与追索流变，一方面揭示出中国通俗文学的古老源头，另一方面又清楚地论述了这种文学样式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与流变的具体过程，为其描画出一条清晰的运动轨迹；第三章着重论述通俗文学的鉴赏问题，主要从方法论上入手，阐述通俗文学的鉴赏原则与鉴赏角度，这是全书之中对通俗文学阅读者、欣赏者最有指导意义的部分；第四章是对通俗文学的分类研究。突出阐述了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两大类，其中对武侠小说的阐述更为深入一些，不仅叙述了这类通俗小说的历史，而且揭示了它的意义与价值，其中“当代武侠小说名家简论”部分是对武侠小说的个案分析，这里边对金庸小说特点的分析比较精采，引人注目。总之，该书在通俗文学的研究与探讨方面带有综合的性质。既有史的方面的纵向叙述，又有横向的分类研究；既有入乎其内的作家作品分析，又有出乎其外的宏观理论把握。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之中，不乏精辟之见。如作者在谈到“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关系时指出：“由于‘俗’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众人容易也

乐于接受的，因此千百年来，各种风俗、习俗、乡俗、里俗因因相传，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而且‘俗’还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在其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在保持了许多民间和世俗文化的原生状态，对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断地向‘雅’输送了许多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养分，在一定程度上孕育、滋养了‘雅’文化。”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引申了一步：“从这个角度上看，‘雅’与‘俗’是相依而存，既矛盾又统一的，两者的长期共存、共荣、相互补充、彼此提携是任何一种大文化得以承传与发展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考之于文学史，民间歌谣之于诗，民间俗调之于词等等，都有一个由俗到雅、雅俗相济的过程，其他许多同类的文化现象更不胜枚举，可见作者之论，精当不移。此外，本书中有关通俗文学的审美特征和语言风格的论断、有关金庸和梁羽生等武侠小说艺术特征的阐释也颇为精到，此处不再一一例举。

当然，任何一门学问都不是一两本书就可以穷尽的，都需要更多的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地修正、丰富、完善、开拓，何况通俗文学批评现在还处在初创时期，理当如此。所以雪坚先生的这部著作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补充、修正、完善、开拓。我们可以预见，在通俗文学领域，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理论批评著作出现，使这一种文学现象真正进入良性循环。然而，无论将来有关通俗文学的研究何等辉煌，雪坚先生今天这样的“基础工程”都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现代人乘坐的高速列车比瓦特蒸汽机带动的火车高明多了，完美多了，可是我们这些后来人能够否定瓦特之功吗？

于景祥

1997年3月15日于沈阳

绪 论

几年前，曾有人写过一本名为《十年喧嚣沉思录》的书，这本书描述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十年间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概貌，阐发了作者对这十年来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些看法和主张。对于这本书的观察视角和基本观点，我们姑且不作分析和评价，不过用“喧嚣”二字来概括这一段中国（大陆）的通俗文学，笔者以为，还是比较恰当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关于通俗文学的话题，无论是在文学圈内还是在整个社会上，确实是热潮迭起，众说纷纭。由街谈巷议进而见诸报刊杂志，后浪追逐前浪，形成了一种四海潮涌、八面来风的热闹局面。从阅读到创作乃至理论批评界、社会热心人士都先后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空前的大潮之中。

当人们回过头来观察这段历史，静下心来面对那些错综复杂的文学及非文学现象时，突然发现，如果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态势而不去顾及或简单对待这一段的通俗文学各方面的现象与问题，该是多么的不明智。

十年的喧嚣，十年的热闹现在都已成为过去。当我们今天面对那喧嚣与热闹之后所留下的诸多问题、诸多现象时，我们的确需要沉思，需要以平和的心态，拉开距离去审视一下呈现在我们视野之中的这一切关于通俗文学的话题、热点、现象，将其内在的前因后果及其与外部的、多方面上下纵横之关系理出一个头绪来。这不仅仅需要进行历史的描述，更主要的是要对所描述的事实与现象给出一个说法，做出一定的

评价。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些过来人对过去有一个完整而理智的认识，才能使我们的后来者在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少走弯路，才能有利于通俗文学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在众多的关于通俗文学的话题中，最为世人所关注、也最易于引起人们争论、令众人产生分歧的，就是关于各种作品的阅读热潮。诸如“武侠热”、“言情热”、“纪实热”等等，都曾先后在社会上引起过很大的反响。这些“热”以及围绕它所发生的争论与争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持续了一段之后逐渐降温了——正如当年“比基尼”泳装刚刚出现时一样，其惊世骇俗的设计所产生的震撼，真的不亚于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上所进行的人类第一次核爆试验。但是当这种泳装从时装展示会走向海滩浴场，溶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时候，谁还会为此而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去议论呢。然而由这些热点的辐射、扩散、延伸而形成的影响，却永久地流布在社会上和人群中。乃至对人们的行为习惯、生活模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积淀成某些文化的因素，附着在历史运动所留下的轨迹上。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今天人们无论在衣食住行、为人处世、人际关系、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等许多方面都与十几年前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变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都可以从那些年的通俗文学作品中寻出一些若有若无、虚虚实实的因果关系来。比如，现在有许多人在口语中用“可怜兮兮”取代过去常用的“可怜巴巴”就明显是受琼瑶小说的影响。当然，这些变化绝不仅仅是通俗文学单一作用的结果，因为文学也只是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而已。

——
时至今日，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对通俗文学存有相当严重的偏见，认为通俗文学就等于庸俗甚至下流的东西，至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曾有一位成人高校中文系的副教授，面对《通俗文学评论》这样正规而严肃地探讨通俗文学理论与实践的专业刊物，竟发出这样的疑问：正经的文学都评论不过来，还有《通俗文学评论》？这位差不多教了一辈子中文（讲授古典文学，而中国古典文学中通俗文学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业绩辉煌）的副教授竟有如此看法，真有些令人无言以对、啼笑皆非。但客观现实是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固执与偏见而有所改变的，不管你是否愿意，也不管你是否承认通俗文学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通俗文学依然存在，依然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发展。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它对整个文学界的冲击与震撼是有目共睹的。曾几何时，一向自诩为文坛正宗的所谓“雅”文学、“纯”文学，在某一天忽然发现自己独领风骚的地位没有了，自己绝对优势的市场占有率突然被通俗文学分走了一大块。原本属于他们的读者，忽然抛弃了他们而倒向了通俗文学。虽然他们因为不能理解而浩叹着世风日下，但面对残酷的事实也只有无可奈何，徒呼惜哉。丧失了大面积的读者，使几乎所有的“纯”文学刊物的发行量一再下降，很多刊物每期只能在几千份上下浮动；而与此同时，通俗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一直保持着上升的势头。一些省市的“纯”文学刊物不得不靠通俗文学刊物在经济上予以扶持和补贴，这真有点让那些自命清高的先生们略感尴尬。

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特别是中间的几年里，通俗文学在中国大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潮。只要我们看看当

时一部分通俗文学书刊的发行量，就一目了然了：在八十年代初，天津作家冯育楠写了一部长篇通俗小说《津门大侠霍元甲》，第一版就印行了180万册。而比它更早的、七十年代末出版的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仅辽宁人民出版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第一次印刷的基础上，在沈阳第一次印刷就有30万册之多。再看一下通俗文学的期刊，上海的《故事会》最高的发行量达到过500万册，杭州的《山海经》达400万册，吉林的《关东文学》达300万册，河北的《神州传奇》、武汉的《今古传奇》每期都在50~100万册之间，安徽的《法制文学》达70万册，辽宁的《大众小说》和《纪实文学》（由原来的大型综合性“纯”文学刊物《春风》改刊而成）因创办较晚，相比较而言发行量算比较少的，但每期也在10万册以上。另外，从读者的构成来看，也足以说明它在社会上的影响。从年龄上看，上至皓首老者，下至毛头少年，从性别上看，有男有女，从职业上看，有大学教授、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大中学生、厂矿企业的在职或退休工人，乃至待业青年、个体商贩等等，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所有这些不同的角度表明，通俗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确实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影响甚大的大潮。当然，这样一个文学现象中有许多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与研究的。

三

任何一种现象都不会是孤立存在的，都有其形成的原因和背景；要想弄清楚中国大陆的通俗文学何以会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十几年间形成一种空前的大潮，必须对那段时间社会的变化、文化的演进作一个客观的描述和理性的把握，因为这恰恰是形成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的历史和社会的

背景。

众所周知，1976年10月，中国的政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又是必然的。

从1976到1978年，这两年的时间内，人们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便是对“四人帮”进行揭批和清算。他们所代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中都被“拨乱反正”了；由他们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都逐渐得到了“平反昭雪”，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全民最后一次集体的政治情绪统一高涨之后被宣告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过去的那种政治时代的终结、新的政治时代的开始。从那以后，关于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追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关于中美建交、关于对越反击战等一系列国内国际重大的政治事件，使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并且逐渐脱离了过去那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趋于实际了。

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追求也与前此的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观念也因国门的逐渐开放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穿着打扮开始追求多样化、多色彩和个性化，过去的那种单调、刻板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人们不再拒绝鲜艳的色彩和独特的款式，不再怕别人议论自己穿“奇装异服”了。于是牛仔装、喇叭裤、西装革履、长裙、短裙不断成为新的时尚，更迭的周期一再缩短，华美艳丽，令人目不暇接。头发的长短、发式的变化逐渐成为纯个人的私事，不再会因为仿效了矢村或真尤美而遭人议论和白眼。在家居的布置上，也逐渐追求舒适安逸。沙发取代了木椅，席梦思取代了硬板床；饮食上不再以讲究吃饱为满足了，而是以追求膳食的营养与结构的合理为时尚；化

妆品已逐渐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必需品，修饰眉眼、涂擦口红保养皮肤甚至成为许多人最重要的业余生活。养花养鱼直至养宠物，不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而成为调剂人们生活、陶冶人们性情的良方。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人们更加关心自己身边更直接、更现实的事情。人们逐渐认识到，把自己身边的“小事”做好不仅更实际，也更有意义一些。人的生命毕竟是很有限的。

政治的变动，给文艺领域带来的首先是文艺政策的调整，而文艺政策的调整最直接的表现是突破了过去的一些“禁区”，这些“禁区”的突破从总体上看，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首先是恢复了“文革”期间被批判、查禁的许多文艺作品重新面世的权力，一大批曾经被斥为“毒草”的电影、歌曲和小说被重新放映、传唱和出版；一时间，刘三姐又回来了，“洪湖水”又重新开始浪打浪了，《青春之歌》又一次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们的案头和书架上了，甚至连“三言”、“二拍”等过去屡遭禁止的作品，也重又在民间传阅，并很快出版了新的版本，且市场情况一路看好。与此同时，港台的流行歌曲及影视作品，南斯拉夫、日本、美国以及西欧等国的影视作品，也都先后扣开中国的海关大门，在中国老百姓中间流行起来。邓丽君以其娇媚绵软的《何日君再来》、《月亮代表我的心》、《美酒加咖啡》倾倒了众多的听众。瓦尔特、杜丘、真尤美、加里森、佐罗，夏子和大宫，幸子和光夫，一时间也倾倒了无数的中国观众。当香港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在一些大城市的电视台播放时，竟达到了万巷人空、争相观看的前所未有的盛况。

所有这些都表明，政治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文艺政策的调整，而文艺政策的调整又隐约透露出未来文艺多元化发展趋势的一些端倪。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些现象和那些文艺作品，不

仅在“文革”期间的文化专制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文革”前，政策相对“宽松”的年代里，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艺，只有符合“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才能在那个时代存在。文艺的多元化反过来也可以证明时代进步了。

文艺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这些变化，其实是适应着人们生活以及生活观念的变化而发生的。生活更实际了，人们对现实及未来生活的看法和追求也更加趋于“世俗化”了。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为后来通俗文学大潮的生成顺理成章地做好了铺垫。

四

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往往是有一定的惯性作用的，当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到来之际，总会有一个过渡阶段，而过渡阶段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承前启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在一种人为强化了“政治”氛围之中，这使他们习惯于集体地听从“政治”的召唤，每当国家的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极强的“参与”意识。1976年10月，中国的政治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动，老百姓和过去一样，毫不犹豫地以极高涨的热情投身其中，而且这种热情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表现在文学领域里，是全国大众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倾向性极为明显的文学作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使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以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报刊杂志在争论，街头巷尾在评说，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但这次的政治变化与以往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不仅仅是过去人们习惯了的路线斗争，而是从路线斗争逐渐导向了全面的改革和对外开放，这却是百姓们始料

不及的。当老百姓们从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中，对外面的世界有所了解和认识之后，当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达到了极限的时候，他们终于顿悟了：自己过去在许多方面是那样的幼稚可笑，原来生活还可以有别样的活法。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态度上，则出现了无论对“伤痕”的、“反思”的还是“批判”的作品的热情都大大地打了折扣；反过来，对消遣、娱乐和轻松的作品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发现了它们的一些妙处。于是欣赏和阅读热点的转移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于是逐渐促成了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通俗文学的大潮。

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通俗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潮，但它在不同的阶段又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只有阅读的阶段

整个通俗文学的大潮是从阅读开始的。当广大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兴趣逐渐脱离了那种“严肃”作品转而寻找“轻松”的作品的时候，我们的通俗文学创作还只是在一个孕育阶段上，创作界还没有能力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作品。所以广大读者在这段时间内不得不把阅读的重点放在过去仅有的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上。首当其冲的是“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一批古典的通俗小说。在当时，一是这些书的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二是虽然这些书都是“白话”的，但毕竟成书于一、二百年以前，语言习惯、历史文化背景的陌生等因素都给这些作品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三是这些作品仍有较为明显劝谕性，娱乐性还是有限的。基于这些原因，广大的读者希望能有比这些更好看、更有趣的作品提供给他们。于是以金庸、琼瑶等为代表的港台武侠和言情小说，以《教父》为代表的英、美、日等国的畅销小说，迅速

而广泛地占有了大陆的通俗文学市场，征服了各个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男女老少读者，掀起了通俗文学作品阅读的热潮。许多人千方百计地搜求，一部接一部地看下去，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捧读者并非少数。许多人还经常互通有无，交换传看，并且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谈论、交流着各自对作品的看法。这就是八十年代最初几年里，大陆通俗文学界最明显的特征。与同时期的非通俗文学相比，它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这些阅读的热潮纯是来自读者自发的行为，而不象“纯”文学那样，有新闻传媒为之推波助澜，把一部作品推向轰动。

（二）创作的起步阶段

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通俗文学的阅读热点与焦点都在港台和国外的作家作品中发生，但也并不是说大陆的通俗文学创作只是一片绝对的荒芜。其实大陆的通俗文学创作也一直在进行着，而且其数量也还是相当可观的，只是其质量上还远远不能与域外的同类作品相比肩，还远没有达到撑起自己旗帜的水准。而且在阅读大潮的冲击下，多为急就之作，因此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是一种鱼龙混杂的状况，绝大多数的作品尚处在起码的水准线之下。

从创作队伍的构成来看，最初的通俗文学的作者大都是业余的，其文化修养和文学素质都很低，在文学界均是无名之辈。这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相比，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无论是写武侠的还是写言情及社会世相的许多作家，一般都具有较为扎实的功底。如平江不肖生、李寿民、顾明道、官白羽以及张恨水、周瘦鹃、王钝根、程小青等人，不是旧学基础很深，就是兼通中西，故而下笔创作常常能够左右逢源、厚积薄发。而从作品的形式来看，也无法与“鸳鸯派”相比，多是不定期的刊物和小报，且出版质量极差。当

时差不多给人这样的印象：封面设计最庸俗、印刷质量最差、内容最荒诞不经的出版物，就是通俗文学。就好像现在大城市的公园里，十几人或几十人乌合在一起，圈起一块地或搭起一个棚子，拿腔作调地喊几句流行歌曲和地方戏，再加上一些低级甚至色情的表演的江湖卖艺的一样，无法令人与艺术相联系。

当时以严肃的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去搞通俗文学创作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的。有时连搞通俗文学创作的人，自己都觉得低人一等，对自己的作品也没有很大的信心，这也是为当时“正统”人士所不齿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用艺术的眼光来看，有许多出版物根本就不能算是文学作品，只是一些低级庸俗的地摊读物，但却以通俗文学的名义出现，主要是这些东西影响了通俗文学的声誉。

（三）双向提高的阶段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通俗文学创作虽然起点比较低，但在积累了一定的量以后，也有了令人鼓舞的进步。这首先表现在作者队伍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一些早已功成名就、在“严肃”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作家，纷纷加入到了通俗文学创作大军的行列。如王蒙、冯骥才、谭力、雁宁（这后两位作家以“雪米莉”为笔名所创作的一系列通俗小说，在全国文学界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争论）等。创作的宗旨也在不断朝着适合通俗文学规律的方向靠拢。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创作界的积极影响，广大读者的文化素质和欣赏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不少中高级知识分子、学者和知名人士，也都先后成了通俗文学的热心读者。像华罗庚、冯其庸等对武侠小说已达到了入迷的程度。他们不但阅读作品，还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关于阅读的体会和看法。冯其庸就曾在一篇题为《读金庸》的文章中非常直率地这样

写道：“我每读金庸小说，只要一开卷，就无法释手，经常是上午完了课（他开始读金庸小说恰好是在美国讲学期间——笔者注），下午就开始读金庸小说，往往到晚饭时，匆匆吃完，仍继续读，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才不得不暂停。如早饭后无事，则稍稍闭目偃卧一回，又继续读下去，直到终卷而止。记得第一部读的是《碧血剑》，我读了一个通宵，第二天白天，稍稍处理了一些事情，就将此书读完。以后每部书只要开读，大抵都是如此。虽然书的卷数有多有少，读的时间也不完全相同，但通宵不寐地读金庸小说，成了我最大的乐趣。”

这一阶段的绝大多数读者，仅以松弛精神，娱乐消遣为目的来进行阅读的。他们没有仰视作品、接受教诲的使命感，只是从自己的角度自由地各取所需，这说明通俗文学的阅读活动更接近原本应有的状态了。

从作品来看，除了较早的《津门大侠霍元甲》之外，像《白衣女侠》、《庄妃》、《神鞭》等也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说明这一阶段的通俗文学，从创作到阅读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

（四）批评与研究的介入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包括创作、阅读、批评与研究，具备了这三个方面，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循环。大陆这十几年的通俗文学是从阅读开始的，当大量的读者渴求阅读通俗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的创作还处在起点之上；而当创作在读者和外来作品的刺激与冲击下有了一定的起色之时，理论研究与批评界，却毫无必要地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矜持与沉默。这几年来，关于当代通俗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所走过的路程是这样的：漠然置之——无原则的否定——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与批评。